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五辑·第十三卷)

[现]傅葆琛
(1893年~1984年)

乡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五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41 - 8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IV. I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30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五辑
[现]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千字

ISBN 7 - 80135 - 741 - 8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com Http: //www. BTE - 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五辑·第十三卷

[现]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傅葆琛乡村民众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 乡村教育思潮的社会性质 (1)
- 乡村教育思潮的历史地位 (3)
- 傅葆琛乡村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4)
- (一)关于对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的信念 (5)
- (二)关于平民教育特别是乡村平民教育的主张 (6)
- (三)关于民众教育特别是乡村民众教育的论述 (7)
- (四)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研究与论述 (8)
- (五)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主张 (9)
- (六)关于识字教育工具的研制 (10)

下 篇

傅葆琛教育论著选读

- 为什么要办乡村平民教育? (15)
- 乡村平民教育实施方法的商榷 (23)
- 平民千字课的教学法 (41)

中国乡村小学课程概论	(46)
学生如何利用假期协助推行乡村平民教育	(70)
乡村平民教育大意	(77)
民众教育的真义与其他教育的关系	(91)
提倡民众教育的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14)
文盲与非文盲的研究	(120)
我国乡村教育家应有的认识	(137)
普及识字教育声中几个先决问题(节选)	(141)
地方民众教育问题讨论(节选)	(150)
民众教育分类的研究和商榷	(158)
我们怎样才能达到人人识字的目的	(173)
对于中国乡村教育建设的一点意见	(184)
民众教育与乡村教育	(189)
民众识字教科书编辑原则的商榷	(196)
乡村小学教师的进修问题	(205)
乡村运动中之乡村教育	(210)
平民教育之魔力	(220)
我们的农民教育实施方案	(227)
乡村小学的地位与乡村小学教师的使命	(229)
我国社会教育的演变及其动向	(234)

上 篇

傅葆琛乡村民众教育 活动和教育思想



乡村教育思潮的社会性质

乡村教育思潮是一种教育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乡村教育思潮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紧密结合的,不受这种政治势力的支配,就必然受另外社会政治的影响。因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乡村教育思潮与社会政治的联系,也绝不能例外。教育思潮总是受制于政治风潮的,为政治服务,而政治决定着教育的性质和方向。

乡村教育思潮是各种乡村改进或乡村建设试验的包容体。同是乡村教育试验,由于主持教育试验的教育团体与教育试验者的政治态度和教育理想不同,其所进行的试验就有社会性质上的差异。象陶行知与黄炎培同是主持乡村教育试验,可是他们之间的试验在其社会性质方面就有区别,而 they 又与晏阳初、梁漱溟主持的乡村教育试验更有社会性质的不同。因此,研究他们各自的乡村教育试验的社会性质,探讨他们的试验过程的政治态度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不是无益的。

陶行知是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人民教育家,他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是想运用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乡村教育,进而改造乡村,改造社会,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他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立案建校,一切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独自提出办学方针。在办学过程中,与共产党地下党员合作,同进步将领冯玉祥来往,支持师生反帝爱国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疑忌。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罪名,停办晓庄师范学校,通缉了陶行知。陶行知只好中断试验,到日本避难。因此,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进行的乡村教育试验,是革命民主主义的教育试验,是为进步师生和农民服务的。

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县徐公桥的乡村改进试验,是贯彻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教育试验,经费是由职教社供给或由工商界捐助,与国民党政府无直接联系。在试验过程中,既未与共产党对立,也不为国民党政府装潢门面。这种试验,可说是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团体,为帮助乡民提高文化水平,实现“富教合一”,改进农村的实验。

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改进社在河北定县进行的乡村改进试验,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美国民间团体的资助和美国援华基金,而且他的试验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赞赏和利用。1932年,国民党政府委托晏阳初拟定《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国民党政府鉴于定县乡村改进和县政建设试验的经验,下令各省仿效建立县政建设实验县。可见,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平民教育试验,受到了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赞赏,其社会性质应属于大资产阶级性质。但也应看到,晏阳初的试验,虽然受到蒋介石政府利用,但不能与蒋介石政府实行的管教养卫一套等量齐观,因为晏阳初开展乡村实验,其着眼点是为了把平民教育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力图解决他认为中国存在的愚、贫、弱、私问题。

至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实行的乡村建设实验,经费全靠封建军阀韩复榘的资助,由地主乡绅出面主持村学乡学和乡农学校,而且他还表明,乡村建设实验的目的就是“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①,其封建性和反动性显而易见。但也不能把他的试验与地主军阀对农村统治办法同等看待,因为他虽然充当了地主军阀的帮手,但他作为新儒家学者是为了实现“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社会理想进行的实验,而当他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卖国,又能在反蒋斗争中做了一些有益革命的事。

综上所述,可见同是乡村教育试验,却有社会性质之别、进步与

^①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280页,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版。

反动之分。但从教育角度看,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高估计了教育的作用,企图不采取暴力革命办法改变政权性质,而通过乡村教育试验,使乡农提高文化教育水平,改造乡村,使农民脱贫致富。这种富有爱国精神与改良主义的措施,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事实证明,只能是良好的愿望而已。这就注定了乡村教育思潮只能是中国教育思想史长河中一度掀起过的波澜,随着人民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又逐渐成为了历史的过去。

乡村教育思潮的历史地位

乡村教育思潮的社会性质,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受到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干涉,但它又有教育的独自特点,有着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对于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乡村教育思潮及其试验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重视乡村教育,把乡村教育与教育实验相结合,运用实验方法研究和推广乡村教育,形成了一次规模浩大的乡村教育高潮。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是对过去只重视城市教育而忽视乡村教育状况的历史性突破,因此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种为乡村教育开拓新路思想和试验,具有教育改革的创新性和合理性。象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不仅为当时社会培养出有科学头脑、农夫身手、改造社会精神的大批新型人才,而且创造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对教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如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县徐公桥的试验,丰富和发展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还对当地乡村改进作出了显著成绩。就是晏阳初主持的平教会在河北定县的试验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试验,虽然受到了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利用和赞赏,而对他们通过教育实验,

对普及乡村教育的探索,对“富教结合”、“政教合一”等各种试验方案的寻觅,这些追求和尝试却具有创造性和历史价值。应以去伪存真办法加以批判继承。譬如,晏阳初提出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梁漱溟实行的村学乡学和乡农学校,这些办学方式和方法,有的适用于一校,有的适用于一区一县,只要以现今的立场观点和科学的理论方法加以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对于丰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教育理论和方法不会是无益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劳心与劳力分离,知识分子不谙稼穡,脱离乡农。可是,乡村教育思潮兴起,大批知识分子由城市奔赴乡村,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为提高农民文化服务,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自觉下农村,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全心全意为穷苦农民及其子女服务的典范。陶行知曾留学美国,身为大学教授,由于认识到下农村办学的重要性,自愿脱下西服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到南京郊区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这种为乡村教育献身的精神,为人们所景仰钦佩,对知识界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乡村教育思潮的兴起,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实践乡村教育的教育运动,为中国教育思想宝库中增添了很多珍贵的思想,也将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教育,给予难得的启迪。

傅葆琛乡村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傅葆琛(1893—1984),四川成都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成绩优异被派往美国留学。1918年毕业于俄勒冈州森林学院。同年秋应聘赴法国,在巴黎、马赛、里昂等地为华工

教育服务 编辑过识字课本和《华工周报》。他在欧洲的三年间,曾赴英、德、比、荷、波、捷、奥、意、瑞士等国考察。1921年返美,初在耶鲁大学森林学院进修半年,旋入康奈尔大学农业研究院研究乡村教育。1924年得乡村教育博士学位,继续在美考察乡村教育半年。

1924年冬,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总干事晏阳初的邀请,回国任该会乡村教育部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8—1931年,先后专任燕京大学教授、齐鲁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江苏省教育学院教授兼研究实验部主任。1931—1936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并先后或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36—1937年休假一年到沪,蓉等地省亲。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返北平,遂应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之聘在成都任教。自1937年—1952年,先后任四川大学教授、华西大学教育系主任、乡村建设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谢绝了友人约他出国工作的邀请,留在成都迎接解放。1950年新中国第一届国际儿童节,在成都华西大学主办儿童教育玩具展览会。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重庆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翌年自请回成都任西南体育学院教授。1955年退休。

傅葆琛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对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的信念

傅先生主张办教育的人对教育要有一定的信仰。他说：“我们虽然不迷信教育万能,我们也不能信教育是万不能的。我们办教育的人,不能对教育没有一点信仰。”从他自己由研究森林学而改习教育学来看,他确实是相信教育能帮助人民改善生活的。所以他说：“现在的教育就是要教人怎样去生活。”

傅先生是研究乡村教育的,他特别强调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提倡用科学方法专门研究乡村教育问题。

在1934年发表的《乡村运动中的乡村教育》一文中,傅先生还提出过乡村教育的四个使命:1.使乡村人民具有人生必需的知识技能,以求改善生活;2.使乡村人民各有相当的机会发展其天赋才能,造成地方领袖和专门人才;3.使乡村人民知道利用乡村的特殊贡献,并且能保存固有的美俗美德;4.使乡村人民了解都市社会的生活情形,且能与都市人民合作,共谋大社会的进步。——这里面不仅指出乡村教育要为改善乡村人民生活培养乡村各项人才、发扬乡村美德服务,而且包含着要通过发展乡村教育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思想,虽然仅仅是这一思想的萌芽,确属难能可贵。

(二)关于平民教育特别是乡村平民教育的主张

傅先生最早对平民教育有这样的看法:“平民教育是求知识的捷径,是最经济的,最简便的,也是最普通的。换句话说,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经费,供给一般失学的青年和成人最要紧最实用的知识。”

在1927年9月发表的《乡村平民教育大意》一文中,他系统地论述了乡村平民教育的性质、目的和内容。他说:“乡村平民教育是为全体失学之青年、成人办的教育,不分地域,不论职业,根据受学者之需要,而供给相当的教育。农、渔、樵、牧,各有应得之知识及训练,皆须一一调查研究,分别传授,方不失乡村平民教育之本旨。”——“根据受学者之需要,而供给相当的教育”。这是傅先生一贯的思想,即教育要结合生活实际的思想。

他在谈到乡村平民教育目的的时候,提出了狭义的目的和广义的目的。狭义的目的在“使失学的青年、成人在最短期内受国民必不可少之教育”。这种教育目的包括三方面:“(1)有运用本国文字之能力;(2)有经济独立之能力;(3)有自治及助人之能力。”广义的目的不限于失学者,也包括未失学者。“因能识写及运用文字之人,

未必即能生产 ;能生产之人 ,未必即能自治及助人 ;富于知识者 ,人格未必高尚 ;人格高尚者 ,身体未必强健。故乡村平民教育……对于未失学而教育不完备之人 ,亦须设法补充其教育之缺陷。”

(三)关于民众教育特别是乡村民众教育的论述

傅先生对民众教育的理论 ,做了系统的研究与剖析。他在 1929 年写的《民众教育的真义与其他教育的关系》、1930 年讲的《乡村民众教育概论》和 1931 年发表的《民众教育分类的研究与商榷》中 ,系统地论述了民众教育和乡村民众教育的性质、定义、需要、范围、目的、原则、种类、与其他教育的关系以及乡村民众教育与城市民众教育的区别等。他把民众教育看做全国国民的教育。在《民众教育的真义与其他教育的关系》中 ,他说 :“ 民众教育 ,不分贫富贵贱 ,男女老幼 ,有知识 ,无知识 ,一切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可能。……凡是有国民资格的民众 ,或不识字 ,或识字而缺乏公民常识、国家观念、社会观念与不能解决自身生计问题的人们 ,正式学校无法帮助的 ,都应在受民众教育之列。”在《乡村民众教育概论》中 ,他从民众教育与其他各种教育的比较中 ,明确提出“ 乡村民众教育是为乡村各种程度、各种职业、各种年龄的人 ,在正式学校教育之外 ,办的学校式的和社会式的各种需要的教育。”1933 年 ,他在《明日之教育》上发表一文专门谈民众教育的定义 ,把民众教育界说为 :“ 民众教育是为一切的民众 ,无论男女老幼 ,有产阶级或无产阶级 ,受过教育或未受过教育 ,有职业或无职业的人 ,施設的一种最机动、最适合、最实用、最简便、最经济的学校式或社会式的教育。”这三个定义 ,虽然繁简不一 ,用语不同 ,但是可以看出傅先生是把民众教育看做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

在《乡村民众教育概论》这篇讲演中 ,傅先生从四个方面提出乡村对民众教育的需要 : (1) 解决大多数人民的教育问题 ; (2) 免除衣食住来源缺乏的恐慌 ; (3) 造就多数有用的乡村领袖人才 ; (4) 挽救

畸形教育之弊病。在这里他一贯强调中国乡村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所以推行乡村民众教育可以解决大多数人民的教育问题,同时也就挽救了只重城市教育、忽略乡村教育的弊端。他一向认为乡村是全国人民衣、食、住生活资料的出产地,推行乡村民众教育可以有助于发展乡村的经济,提高乡村的劳动生产率,增加生活资料的来源。

傅先生在谈到民众教育与其他教育关系的时候,特别强调了民众教育促进义务教育的关系。我国至今初等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乡村中受重男轻女旧思想的影响,许多女孩子失学,成为文盲半文盲。所以家长不重视子女的教育,是义务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之一。我们在乡村推行成人教育,可以改变他们的旧思想、旧观念,有利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因此他的这一理论并未过时。

他在谈到推行乡村民众教育注意事项的时候,提出要注意五点:(1)推行的步骤要根据乡村民众的心理与态度;(2)组织与方法要考虑本地特殊需要;(3)工作范围的大小要审度经费、人才的能力;(4)成绩的评价要看本地人民自动、自助的量度;(5)事业的成功要依靠个人的信仰和努力。——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主张教育要结合实际、从实际出发。

(四)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研究与论述

傅先生对扫除文盲的工作做过不少科学研究。在1930年发表过《文盲与非文盲的研究》,1940年又发表过《肃清文盲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前一篇文章提出“什么人 是文盲?”“怎样知道谁是文盲?”等问题。文章分析了国内那时对确定文盲标准所用的各种测验,觉得还不大合用,因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为普及识字教育,文盲的标准当然不能定得太高。若为考查一般人最低限度的共和国民必需的本国文字教育程度,则文盲标准似乎不能定得太低。最好我们

定出两种文盲标准,以备教育家和政治家用。”他主张前一种标准在于能分别出什么人应受识字教育,什么人可以不必受识字教育。他还主张识字课本若分为四册,还要区别出什么人应从第一册读起,什么人可以从第二或第三或第四册读起。“根据他们的程度施教,既可适应他们的需要,又免得虚掷他们的光阴。”这样,既便于学,也便于教。

后一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有关扫除文盲的问题,至今对于我们从事扫除文盲工作,仍有参考价值。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有这样两点说法:第一是强调普及义务教育,杜绝新文盲的产生:“如果义务教育不普及,民众教育永久也不能普及,文盲也永久不能肃清。”“厉行义务教育,就是肃清未来的文盲。”“义务教育实为除文盲斩草除根之计,也就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也。”第二是主张扫除文盲(治愚)与解决温饱问题(救穷)应当同时并进:“救穷虽是治愚之道,治愚也是救穷之本。穷与愚这两个社会病态是互为因果的。救穷与治愚这两种工作,不容易分出此轻彼重,此先彼后,而是应当同时进行,相提并论,互为声援的。”他的这些主张是从实践中来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不仅值得从事扫盲工作的人重视,而且值得从事其他教育工作的人重视。

(五)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主张

我国乡村教育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为乡村建设运动。一些好心的知识分子是希望不仅用教育的力量,而且结合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力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新农村。但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总方针指导下,它的一切作为当然同那些好心的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无法合拍的。他在《乡建运动总检讨》一文中谈到中国的乡村建设要靠学术的、社会的、政治的三种力量,特别说到“人民尤须具有了解乡建、接受乡建、自动努力乡建之精神”,这种把希望寄托

在人民身上的想法,当然是正确的。他在驳斥“乡村都市化”即依赖都市建设乡村的主张时说:“在中国,农业是根本,工业是花果,没有农业,便没有粮食和原料,焉有工业?”因此乡村建设比都市建设尤为重要。至于不能依赖都市来建设乡村,“一来因为都市的繁荣还须靠乡村作后盾,二来因为中国乡村幅员广大,都市寥寥无几,即使全国所有的都市都尽量扩张他们的力量,也只能建设附近的乡村,对于较远的乡区便有鞭长莫及之感,因此许多乡村仍不能不自力更生,寻觅自救、自治,解决自身问题的途径”。因此,“‘乡村都市化’的主张……只是片面的见解,可用之于产业革命后都市发达的欧美工业化国家,而不适用于中国。”后来,他在《乡村建设与都市建设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乡村建设和都市建设双管齐下、同时并进的主张,认为二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但“如就轻重缓急而论,则乡村建设比都市建设尤为迫切需要”。因为“乡村是都市的大后方,是都市的供应处。我们要想繁荣都市,振兴工业,必须首先建设乡村,发展农业。农业发展,工业才有供给,乡村巩固,都市才有所凭借。”

1930年5月和10月,傅先生两次拟订过培养乡村领袖人才特别是乡村教育人才的计划。他所谓乡村领袖人才,其实就是乡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包括乡村教育人才、社会服务人才、体育卫生人才、农业人才等等。因此建议各大学开设乡村教育科目、乡村社会学科目、乡村文学科目、乡村史地科目、乡村政治经济科目、乡村数学科目、乡村理化科目、乡村体育及卫生科目、乡村生物科目、乡村工程科目、乡村家政科目和农业科目等。希望各高等学校能为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培养各方面的人才。

(六)关于识字教育工具的研制

傅先生早在从事华工教育期间,就曾编辑过《通俗六百字韵言》、《通俗新知识课本》,在平教会工作期间曾编辑过《农民千字

课》。但是他对所编的这些识字教育的工具,并不满意,因此继续对此进行研究。

他主张识字教育应当以教基本字(即各行各业的人共同必须识的最常用的字)和补充字(某一行业的人必须识的常用字)为主要任务,所以识字课本主要应选教基本字和补充字。至于常识教育的内容,不宜作为识字课本的主要部分,以免照顾了内容而不能兼顾识字。

他在1930年发表过《汉字“基本字”研究的初步》、《评〈基本字汇〉》,1931年发表过《改良康熙字典式字典的建议与编辑民众实用字典的商榷》,1932年发表过《民众识字教育与民众基本字》,1933年又发表《民众识字教科书编辑原则的商榷》等文。这些文章都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比较对照、分析综合各种有关的事实材料写成的。

傅先生的教育思想当然不止上述几点,还有关于社会教育的主张、关于国民教育的主张、关于在校学生和小学教师协助推行民众教育的主张,对于乡村小学课程的研究和主张,对于编辑民众报纸的见解等等。

综上所述,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傅葆琛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民主的教育家。